

黄保真 蔡钟翔 成复旺 著

中國文學理論史
(四)

北京出版社

(京)新登字 200 号

内 容 提 要

本册(第六编)主要阐述明清之际至鸦片战争前夜的文学理论。这一时期的文学理论是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总结,门类齐全,内容繁富,既充分反映了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系统性,又带有十分突出的保守性。本书作者紧紧抓住这种历史特征,从对整个中国古代文论进行历史总结的高度,对这一时期的文学理论作了相当详尽的论述。一些不大被人注意的小家得到了应有的反映,一些重要理论家和理论观点更得到了全面而新颖的剖析。因此,本册不仅有助于掌握这一时期的文学理论,也有助于认识整个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民族特征和历史命运。

中国文学理论史 (四)

Zhongguo Wenxue Lilun Shi

黄保真 蔡钟翔 成复旺 著

北京出版社出版

(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

邮政编码: 100011

北京出版社总发行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广益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24.25印张 604 000字

1991年10月第1版 1991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 000

ISBN 7-200-01358-7/I·189

定价: (精) 14.00元

本册(第六编)第三章“清代的诗论”由成复旺撰写，第五章“清代的小说戏曲理论”由蔡钟翔撰写，其余由黄保真撰写。

目 录

第六编 从明清之际到鸦片战争前夕的文学理论

概 述	(3)
第一章 明清之际文学思潮的转变	(11)
第一节 陈子龙——从主张复古到提倡“讥刺”	(12)
第二节 艾南英的时文——古文理论	(33)
第三节 明代文学理论的总结者——钱谦益的诗文理论	(50)
第四节 冯班、吴乔、贺裳的诗歌理论	(78)
第五节 黄宗羲的诗文理论——回顾、总结、求变	(92)
第六节 顾炎武的以学为文的文学观	(119)
第七节 王夫之的杂文艺哲学	(139)
第二章 清代的文论	(213)
第一节 清代文论的开拓者——侯方域、魏禧、汪琬的古文理论 附廖燕	(214)
第二节 桐城派的文论	(253)
第三节 戴震等经学家的文论	(291)
第四节 章学诚的文章社会学	(314)
第五节 恽敬等阳湖派的文论	(350)
第三章 清代的诗论	(363)
第一节 清代诗歌理论的历史特征	(363)
第二节 叶燮《原诗》	(369)
第三节 王士禛“神韵”说	(401)
第四节 沈德潜“格调”说 附李重华、黄子雪、郑燮	(443)
第五节 翁方纲“肌理”说 附赵执信	(479)

第六节	袁枚“性灵”说 附吴雷发、赵翼·····	(512)
第四章	清代的词学·····	(572)
第一节	《词苑丛谈》和清初词论·····	(572)
第二节	陈维崧、蒋景祁与阳羨派词学·····	(584)
第三节	朱彝尊、厉鹗、郭麐和浙西派词学·····	(596)
第四节	张惠言、周济与常州派词学·····	(609)
第五章	清代的小说戏曲理论·····	(625)
第一节	清代小说戏曲理论的发展·····	(625)
第二节	金圣叹·····	(638)
第三节	毛宗岗 附毛声山·····	(671)
第四节	李渔·····	(688)
第五节	孔尚任·····	(718)
第六节	张竹坡·····	(730)
第七节	脂砚斋·····	(742)
第八节	焦循·····	(753)
第九节	梁廷枏·····	(766)

**第六编 从明清之际到鴉
片战争前夕的
文学理论**

概 述

从明清之际到鸦片战争，这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最后二百年，也是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总结过去、蜕旧变新的时期。从政治经济的状况，社会矛盾的发展，文学思潮的沿革来看，明清之际的几十年与清代盛、中时期，有着明显的不同。明清之际，在中国政治史上，是两大封建王朝兴亡交替的时代，极端尖锐的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一方面表现为全国规模的，在明、清两个封建政权和各地农民起义武装之间，交错进行的军事对抗；另一方面则表现为中国传统的思想、文化，特别是学术、文艺思潮的深刻变革。军事斗争的结果是：以汉族地主阶级为主体，以汉族为统治民族而建立的明王朝，在农民起义的洪波巨浪中土崩瓦解；一个刚刚跨进封建社会门坎的少数民族满洲贵族建立的政权，联合部分汉族官僚地主，镇压了农民起义，扫荡了残明势力，夺取了全国的统治大权，而成了中华民族大群体中的统治民族。金戈铁马的阶级对抗，野蛮残酷的民族征服，严重地破坏了社会生产力。许多地区在劫灰之余，“一户之中止存一二人，十亩之田止种一二亩”。特别是南方，原来市镇手工业十分发达的苏州、松江、嘉定、江阴和漳州、广州等地，兵燹过后，“城无完堞，市遍蓬蒿”，残破已极。从明代中叶开始，在封建经济母体中迅速成长的资本主义因素，被无情地摧折了。民族地位的巨变，不仅使广大汉族人民蒙受了屈辱、灾难；而江山易主，国破家亡，更使原来的统治阶级——汉族地主阶级中的大多数感到创巨痛深。这个时代的精神生产的主要承担者，汉族地主阶级中的那些具有高度政治文化修

养,而又活跃、敏感、善于思考的积极成员,虽然在事变发生前就觉察到时代的危机而思作挽救之计;在事变过程中也曾奔走呼号,掷首沥血,但终于失败了。劫后幸存的志士们,歌哭之余,继以沉思,便以冷静的理性,批判、审察历来的政治体制,清理、总结中国的传统文化,其中对民族的文学理论,尤其是对明代文学的演化历程,进行了系统的、深刻的反省,借以寻求民族复兴的正确道路。另外有一部分人,在民族斗争中,首鼠两端,但在由主子降为奴才之后,也难免心存故国之思,借整理胜朝文献以寄余生,其理论思维的成果,也不乏客观的历史内容。当然,也有某些汉族地主阶级知识分子,既无强烈的民族意识,也无鲜明的政治倾向,易代之际,坐观兴亡,新朝定鼎,随遇而安;他们在艺术上和理论上,也具有一定的创造能力,也为这个时代奉献了自己的精神产品。因此,这一时期的文学理论,虽然是以批判总结,追求新变为主流,但也呈现出多样的色彩。

其一,作为时代精神的代表者,一代新风的开路人是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他们都在民族斗争中经受了血与火的锻炼,因而怀着深广的民族的幽愤去推动文学思想的变革。黄宗羲不仅系统地总结了明代文学的经验教训,而且提出了不畏邪恶,反抗压迫,与“危时”、“厄运”奋力抗争的文学思想,阐明了表现真性情、真思想、真学问、真历史的创作原则。顾炎武主张以学为文,经世致用,力图把文学引上爱国救民的轨道。王夫之则以哲学家的深邃理性,思辨方法,全面地总结了中国古代的政教中心论、审美中心论两大流派积累的思想资料,建立了体系完整的、具有鲜明的民族特征的杂文艺哲学。

其二,以陈子龙、魏禧为代表的文学家中的志士,也各自提出了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的文学主张。陈子龙从一个继承“七子”衣钵的复古主义者,转变为提倡明“源”、审“境”,“忧时托志”,“讥切当世”的进步的理论家,既说明了时代矛盾、现实斗争对艺术

家、理论家的决定性影响，也显示了明清之际文学思潮变化革新的历史趋势。魏禧作为文学家中的志士，提倡宣道义、辨邪正、寄壮志、悯时忧民之文，要求作家在生活实践中“积理”、“练识”，待时局一旦有变，能“有益于世”。作为志士中的文学家，他又注意总结文学艺术自身的规律，主张顺人情，随物理，以“变”为“法”，从多方面揭示了文学创作中各种因素相辅相成的辩证规律。

其三，以钱谦益为代表的一批理论家，着重于对有明一代的诗歌创作的经验，文学思潮的演变，进行批判总结。钱氏其人，大节有亏，一时节义之士多不屑齿及；但他毕竟在明清之际，主盟东南文坛达数十年之久，对明代学风、文风、士风的流弊，感受甚深，其理论思维的具体成果，相当系统也相当深刻地表现了一定时代的客观历史内容。

其四，是汪琬一流与新王朝合作的名士文人。他们从创作和理论两方面都尽量适应清廷的需要，提倡义理、经术、辞章、史学合一。在政治上主要以融汇“道学、儒林”的方式来统一思想；在艺术上则着重总结一般规律而力求规范。官方说他“学术既深，轨辙复正”，为清初文界“风气还淳”做出了贡献，不是没有道理的。

其五，小说、戏曲理论家金人瑞（圣叹）、李渔等人的杰出成就，也为这个时代的文学思潮增添了异彩。金人瑞是一个思深悟锐、颇有“异端”色彩的文人。李渔则近乎是纯粹的艺术家、艺术理论家。在中国古代文学观念变化沿革的历程中，他们代表着一批先进者。中国古代最为系统的小说学、戏曲学，可以说是在他们手中完成的。

总的说来，残酷激烈的民族斗争，对这一时期的文学理论刺激最大；而明代复古与反复古两种文学思潮的斗争、消长及其产生的流弊，也推动着人们从社会现实和经、史、实学两方面，为文学寻求出路。虽然传统的政教中心的文学原则被重新加以强

调,但理论家们却普遍地重视人的情感的历史内容、社会价值和审美价值,因而对艺术规律的总结,较之前人也更深刻、更系统了。

从康熙初年至道光初年,这是清王朝稳定、发展,又开始转衰的时期。康熙初年,易代之时发生的民族之间大规模的武装冲突,告一段落。清廷便主要致力于发展社会经济,巩固专制政体,加强思想统治。在经济方面,由于清廷采取了停止圈地、鼓励垦荒,提高佃农、雇工地位,全面改革赋役制度等几项重大措施,所以百余年中,就使全国的耕地面积和农作物产量,超过了明代,而手工业的规模及其中资本主义因素的成长,也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在政治上,除了继续强化专制政体之外,并进一步笼络汉族地主阶级以扩大统治基础,缓和民族矛盾。除了增加科举的录取名额,又开设了博学鸿儒科以网罗汉族名士,一时学者如汪琬、朱彝尊、毛奇龄以及尤侗等人纷纷应选。而在思想文化方面则采取了高压与劝诱相结合的两手政策。一是祭孔庙、谒明陵、旌表明室忠臣、谴责贰臣降将,用加强忠君为主的封建伦理观念的方法,来消除传统思想中的“夷夏之防”。二是大力提倡程、朱理学,重刊《性理大全》、编写《性理精义》、辑印《朱子全书》,重用“理学名臣”。同时,也承认汉学的合法地位,以开四库馆整理文献为契机,大兴考据之风,把更多的汉族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在精神文化上的创造力,纳入清廷预定的轨道。三是提出“清真雅正”的衡文标准以规范文风。把“清真雅正”作为衡文标准,是在雍正十年的上谕里明确颁布的(见梁章钜《制艺丛话》卷一),但是这样的思想、艺术标准,在康熙年间就早已提出来了,而乾隆时又反复申明这一宗旨。康熙二十四年御选的《古文渊鉴》,乾隆元年钦定的《四书文》,乾隆三年、十五年御定的《唐宋文醇》、《唐宋诗醇》,都是以规范文风,便于举业为目的。清初时文名家韩荻,官至礼部尚书,其《有怀堂文稿》卷四中《乙卯顺天乡闈墨序》、《张寄亭稿序》、《全章

文选序》、《丁丑房书序》等文，对明以来制艺的沿革利弊，评析甚详，所以方苞说他是清代时文中起衰救弊的韩愈。乾隆十七年的上谕中指出，“韩菼种学绩文，湛深经术，制艺清真雅正，实开风气之先”。又如李光地，官至吏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其人颇以迎合时主，贡谀献颂为能。他的《榕村诗选》则专选有关性情伦理之作。另外蔡世远所选的《古文雅正》一书，选文以理为根柢，而体杂语录者不登；以词为羽翼，而语伤浮艳者不录。“名之曰雅正者，其辞雅，其理正也”。其书兼收俚偶，只论词义是非，不分格律今古，在当时影响很大。方苞奉敕编选的《钦定四书文》可以说是官方的文学思想、文学政策的具体表现和总结。所以《四库提要》说：“我国家景运聿新，乃反而归于正轨。列圣相承，又皆谆谆以士习文风勤颁诰诫。我皇上复申明清真雅正之训。是编所录，一一仰禀圣裁，大抵皆词达理醇，可以传世行远。承学之士，于前明诸集，可以考风格之得失；于国朝之文，可以定趋向之指归。圣人之教思无穷，于是乎在，非徒示以弋取科名之具也。”这就把“清真雅正”对于一切形式的文学创作的普遍意义讲得非常明确了。四是与怀柔利诱相辅相成的血腥镇压。虽然文字狱古已有之，但清代文网之密，波及之广，杀戮之惨，告讦之盛，推求之妄，都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顺治时文字狱就已有多起，康熙时的“明史案”、“南山集案”，雍正时的“吕留良案”，“查嗣庭案”等，都是历史上著名的大案。自称文治武功前古未有的“十全老人”乾隆皇帝统治的时期，史有明文的大狱，竟达七十余起。在如此严酷的文化专制、政治高压之下生活的知识分子，动触时忌，祸连九族，还有什么思想、学术，创作、评论的自由可言！

在社会经济发展，政治局势稳定和清廷两手政策作用下，康、乾时代的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便从明清之际以“经世”为主遁入以“避世”为主的轨道。从表面上看来，流派众多，名家林立，但思想倾向色彩单调。诗论中以王士禛为代表的“神韵派”，沈德潜

为代表的“格调派”，翁方纲为代表的“肌理派”；词论中以朱彝尊为代表的“浙西派”；文论中以方苞为始祖的桐城派；都以各自的方式体现了清廷对学术、文艺的规范和需求。《四库提要》中介绍御定《唐宋文醇》、《唐宋诗醇》时的几段话，颇能帮助我们领悟这一时期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流派的多样性和倾向的一致性。其论《唐宋文醇》则曰：“唐之文体，变于韩愈，而柳宗元以下和之；宋之文体，变于欧阳修，而苏洵以下和之。……茅坤所录，大抵以八比法说之，储欣虽以便于举业讥坤，核其所论，亦相去不能分寸……我皇上表章古学，示所折衷，乙览之余亲为甄择。其上者足以明理载道，经世致用；其次者亦有关法戒，不为空言。其上者矩矱六籍，其次者波澜意度，亦出入周秦两汉诸家。至于品题考辨，疏通证明，无不抉摘精微，研穷窅奥”。至于《唐宋诗醇》，所选以李白、杜甫、白居易、韩愈、苏轼、陆游为大宗。《四库提要》中论其目的则曰：“国初多以宋诗为宗，宋诗又弊。士禎乃持严羽余论，倡神韵之说以救之。故其推为极轨者，惟王、孟、韦、柳诸家。然《诗三百》尼山所定。其论诗，一则归于温柔敦厚，一则谓可以兴、观、群、怨，原非以品题泉石，摹绘烟霞。泊乎畸士逸人，各标幽赏，乃别为山水清音，实诗之一体，不足以尽诗之全也。宋人惟不解温柔敦厚之义，故意言并尽，流而为钝根；士禎又不究兴、观、群、怨之原，故光景流连，变而为虚响。各明一义，遂各倚一偏，论甘忌辛，是丹非素，其斯之谓欤？我皇上圣学高深，精研六义，以孔门删定之旨品评作者，定此六家，乃共识风雅之正轨。”（《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九〇）由此可见，在诗文创制中，宗唐祖宋，摹杜范韩；神韵格调，性灵肌理；畸人逸士，流连光景；正人君子，兴观群怨；都能各标一义，各得一体。或直接有益名教，或间接陶冶性情，可以复古亦不妨奇创。聪明的封建统治者，其控制文艺创作，支配精神生产，不仅知道屠刀牢狱的奇效；同时也深知艺术规律的功能。他们充分地利用了

历史上不同艺术流派的楷模作用，巧妙地驾驭着艺术规律自身中不同方法、不同要素的矛盾统一关系。建筑在地狱边缘上的盛清文坛与论坛，之所以还会出现众多流派斗妍争荣的奇异景象，其奥秘大约就在于此。也正因为如此，在“清真雅正”规范之下的各派理论家们，没有人能够、也没有人敢于探求新的资本主义因素成长向文学理论提出的历史课题，而是着力于总结前人积累的艺术经验，把传统的政教中心、审美中心的两派理论，融会贯通，以形成各有特色的系统的诗文理论。文论家如方苞、刘大櫆、姚鼐，诗论家如叶燮、王士禛、沈德潜、翁方纲，都有可观的理论成就，但也都没有能够指出未来文学的正确方向。在这个时代，从思想上或艺术上提出一定新的见解，发出某种不谐和音调的主要理论家，有提倡抒写“性灵”的袁枚，敢于非议程、朱的戴震，畅论“六经皆史”的章学诚等。不过，他们在文学理论领域里，也主要是批评清代文坛“正宗”的代表者，即诗论家中的神韵——格调派和文论家中的桐城派的某些观点。论其实质，还是属于地主阶级内部不同思想倾向、艺术倾向之间的矛盾。但是，他们在清代进步文学思潮发展的历程中，毕竟起了承上启下的作用。如袁枚推动了文学观念的变革，而戴、章等人则把文学思潮从“避世”又重新挽入“经世”的轨道。这一时期的戏曲、小说理论，则在清廷严酷的禁毁政策和封建正统文学观念的双重钳制下，也艰难地向前发展。其理论成就，从总体上说没有超过明清之际的金、李等人，但围绕着《金瓶梅》、《聊斋志异》、《红楼梦》、《儒林外史》几部小说而发展的评点之学，提出了不少新的见解，为近代小说理论的变革开辟了道路。

从乾隆末至道光初，盛极一时的清王朝又迅速地衰落了。土地的高度集中使阶级矛盾激化。而整个统治机器腐朽糜烂的进程，更超过了经济的衰退。各级官吏贪污成风，秉政近三十年的宠臣和珅，几乎把同时期国库收入的一半饱了私囊，满洲贵族的腐化

程度由此可见一斑。这又使民族矛盾再度激化。嘉庆元年(1796年)爆发的川、楚、陕、甘、豫五省白莲教农民大起义,使清王朝从此一蹶不振,而世界资本侵略势力的魔影,也一步步逼近了这古老的“天朝”。封建士大夫中的某些敏感分子,不仅在学术上鼓吹经世致用,在文学理论中也曲折地要求干预现实了。以张惠言、周济为代表的追求“比兴”、“寄托”、“变风之义”的常州派词论的兴起,就部分地反映了这种时代心理,而为近代谭献、庄棫、陈廷焯等人提倡忧世念乱,感时伤事的词学开了先河。至于阮元、李兆洛、包世臣、龚自珍以及姚鼐门下诸弟子中的刘开、管同、方东树等人,虽然生活在这一时期,但他们的文学思想直接关连着近代的变革,就留待第七编中进行评述了。

第一章 明清之际文学思潮的转变

明清之际，在中国政治史上是两大封建王朝兴亡交替的时期。这时的中国社会经历了一个发展、停滞、倒退的特殊过程。各种社会矛盾都呈现高度激化的状态，而作为支配社会生活、决定时代特征的主要社会矛盾，则由阶级斗争迅速转变为民族斗争。这一切表现在精神领域中，就是士风的转变，学风的转变，文风的转变；而文学思想及其理论形态，自然也随之而转变。文学思想的转变是从明末开始的。那时，地主阶级中以陈子龙为代表的有识之士，在一种巨大的社会危机感的推动下，从缅怀古昔，追慕盛世的迷梦中醒来，起而大声疾呼，要求文学关注危殆已极的社会现实；与此同时，也有人着手总结有明一代文学沿革中的经验教训，力图矫正腐败的文风、学风与士风。明清易代，惊心动魄的民族斗争，把文学创作与文学理论的变革带到了新的阶段、推上了新的高度。这时，杰出的思想家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满怀时代的悲愤，对中国两千年的封建社会作批判检讨的同时，提出了深刻、系统的文学思想。失足贰臣如钱谦益辈，痛定思痛，便借评述有明一代的文学，寄托故国之思，也发表了不少精当的见解。这些都是动荡时代的生活之树上结出的理论之果，既批判地总结了过去，又有力地影响着未来，对清代的学风，文风和文学理论的发展起了开拓道路的历史作用。

第一节 陈子龙——从主张复古到提倡“讥刺”

明代末年，在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领域中，论成就都堪称为一代高峰的，是陈子龙。陈子龙(1608——1647)字人中、卧子，又字懋中，号轶符、大樽，松江华亭(今上海松江)人。崇祯十年进士，选绍兴府推官，摄诸暨县事，以救灾、“平乱”有功，授兵科给事中，命甫下，闯王入京。南明时以原官补用，在五十天内，上谏疏三十余道，均未被采纳。他见马、阮专政，事不可为，借口“葬亲”，退居家乡。南京失守后，他与夏允彝一道，在松江起兵抗清，城破，变服为僧；又结太湖兵谋起义，事泄被捕，投水而死。清乾隆时，追谥“忠裕”。有《陈忠裕公全集》、《安雅堂稿》等。

陈子龙一生走过的是从文学名士到民族志士的道路。这两者虽然不能绝然分开，但在他的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中，却留下了互相关联而又彼此不同的印记。从中不仅使我们看到了陈子龙文学思想的发展，也可以窥见明末社会矛盾的激化及其对文学思潮转变的有力影响。

陈子龙在少年时代就颇有文名了。青年时期，他又与同郡夏允彝、徐浮远、周立勋、彭宾等结几社，共肆力于诗古文词。这时，文坛上代后七子而起的公安、竟陵二派，其末流或纤巧、莽荡，或凄寒、衰飒，弊已不可胜言。陈子龙等，“慨然欲廓而清之”，但一时并没有找到正确的理论、方法、道路，而是重新打出前后七子的“复古”旗帜。其《自撰年谱》于崇祯元年，记载了他与艾南英的一场争论，颇能说明他早年在理论和创作上的倾向：“秋，豫章孝廉艾千子……与予晤于娄江之弇园，妄谓秦汉文不足学，而曹、刘、李、杜之诗皆无可取，其罾北地、济南诸公尤甚，众皆唯唯。予年少在末坐，摄衣与争，颇折其角。彝仲辈助

之，艾子拙矣，然尤作书往返，辨难不休。”其实，争论的双方，目的都是要矫正明末文坛的弊端，分歧在于用什么样的理论、方法，走什么样的道路。争论的文字材料，在艾南英的《天慵子集》中尚存《答陈人中论文书》、《答夏彝仲论文书》等，而陈子龙的论辩书信，却没有留存下来。但从艾南英的驳论中，可以看出，这场争论的实际内容，是明中叶以来，唐宋派与秦汉派之间争论的继续、深化或概括、总结。但由于论争双方、颇挟意气，称引论敌，多取断章。因此，我们今天是不能据以论定陈子龙的真正主张是什么。我们只能从今存的陈子龙的有关文章中，来具体把握他早年的文学思想。象《壬申文选凡例》、《皇明诗选序》、《答胡学博》等文所阐述的观点就很有代表性。例如：

文史骚赋，异轨分镳，临邛、尤门，未兼两制，自兹以后，备体为难。典则之篇，尤穷时口，何得藉口壮夫，呵为小道。文当规摹两汉，诗必宗趣开元，吾辈所怀，以兹为正。至于齐梁之贍篇，中晚之新构，偶有间出，无妨斐然。若晚宋之庸沓，近日之俚秽，大雅不道，吾知免夫。（《壬申文选凡例》，见《陈忠裕公全集》卷三十）

自弘治以后，倣傚瑰玮之才间出继起，莫不风雅自任，……凡虞歌、殷颂，周雅、楚骚，罔不穷其拟议，巧其追琢……作者既多，莫有定论，仁鄙并存，雅正无别，近世以来，浅陋菲薄，浸淫于衰乱矣。子龙不敏，悼元音之寂寥，仰先民之忠厚，与同郡李子、宋子网罗百家，衡量古昔，攘其全秽，存其菁英……揽其色矣，必准绳以观其体；符其格矣，必吟诵以求其音；协其调矣，必渊思以研其旨，大要去淫滥而归雅正……诗由人心生也，发于哀乐而止于礼义，故王者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皇明诗选序》，见《陈忠裕公全集》卷二十五）

国家右文之化，几三百年。作者间出，大都视政事为隆替。孝宗圣德，侔美唐虞，则有献吉、仲默诸子，以尔雅雄峻之姿，振拔景运。世宗恢弘大略，过于周宣、汉武，则有于鳞、元美之流，高文壮采，鼓吹休明。……万历之季，士大夫偷安逸乐，百事堕坏，而文人墨客所为